

桐城
历史
文化
丛书

桐城

明清诗选

潘忠荣 主编

TONGCHENG MINGQING SHIXUAN

安徽美初出版社

中国是诗的国度，桐城是诗的乡邦，桐城人自小就是在文风诗雨的浸润中长大的。那些对诗情有独钟的文人以诗会友、以诗抒怀、以诗怡情，终生乐此不疲，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

雅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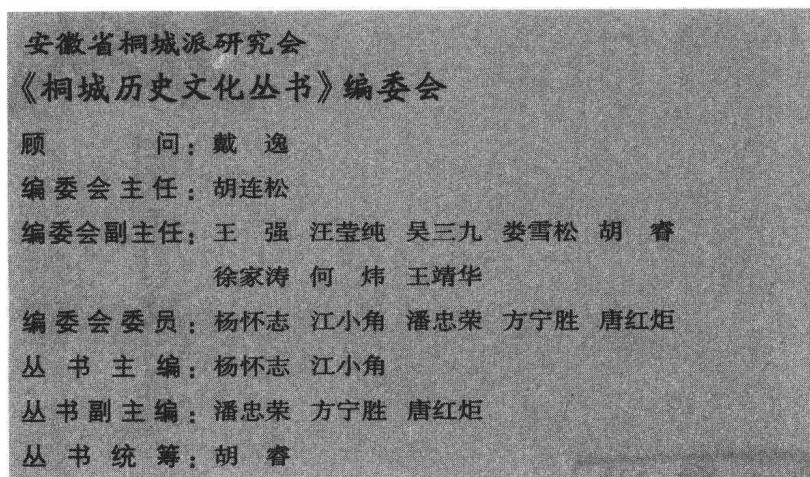
桐城明清诗选 / 潘忠荣主编. — 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1.8

(桐城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398-2976-0

I. ①桐… II. ①潘…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2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1938号



桐城历史文化丛书

桐城明清诗选

潘忠荣 主编

出版人 郑可 责任编辑 郑可 黄奇 陈远

策划 田海明 韩进 责任校对 史春霖

项目总监 武忠平 陈涛 装帧设计 武忠平 陈涛 陈远

项目助理 王爱华 责任印制 李建森 徐海燕

特约审读 王玉佩

出版发行 安徽美术出版社 (<http://www.ahmscbs.com>)

社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 0551-3533604 (省内) 0551-3533607 (省外)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4 书 号 ISBN 978-7-5398-2976-0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定 价 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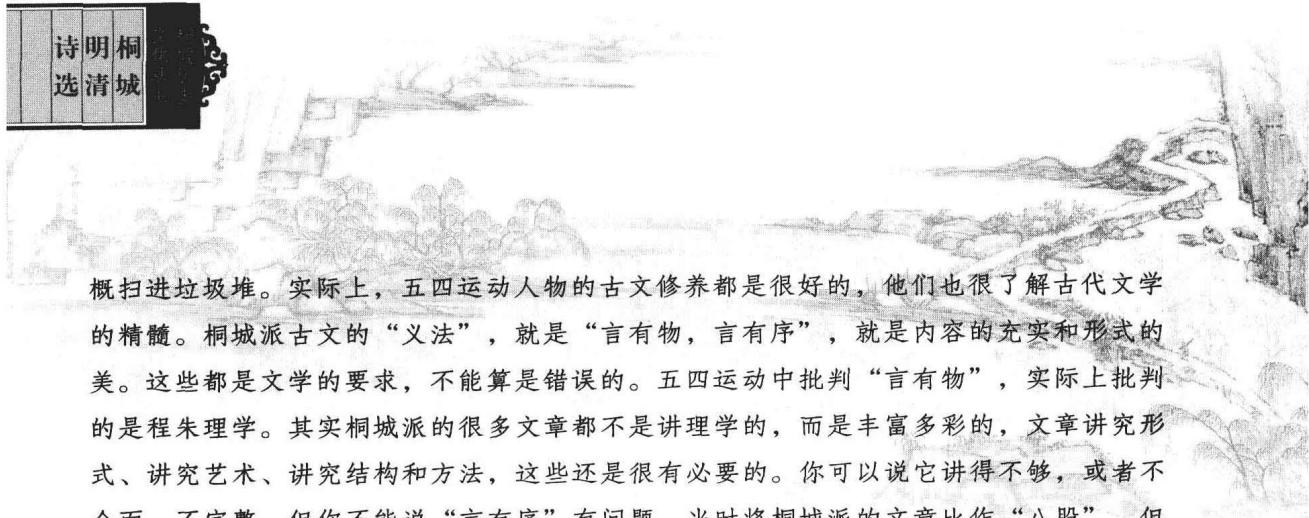
本书法律顾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序一

戴逸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桐城文化真正产生影响应该是在明清两代。明代中后期，桐城文化勃然兴起，硕学通儒不断涌现，达官显宦、文豪诗人接踵而出。他们或以气节名垂青史，或以结社各领风骚，或以文章传诸后世，或以讲学名扬四方，或以政声享誉朝野。清代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作家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流行区域最广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得名是由于它的先驱者戴名世、创始者方苞、发展者刘大櫆、集大成者姚鼐皆为桐城人。再有方东树、刘开、姚莹、戴钧衡、方宗诚、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后继者不断传播，创下了中国文坛特有的奇观。直到清朝末年，李鸿章还说：“今天下古文者必宗桐城。”桐城派的散文创作和文论主张，被清朝统治阶级视为正统文化，对促进满汉民族融合，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桐城文化在明清时期影响巨大，毋庸置疑。

由于编纂清史，我有幸再次认识桐城派。桐城派是清代历史上一个主要的文学流派，它的重要性、价值和影响都不容低估。从历史的发展和演进来看，清代桐城派传承了六七代，前后二百余年，从康熙时期一直到五四运动，从方苞到范伯子，可以说是薪火相传。学术的发展一定是团体的发展，仅仅依靠某一个体是不够的。中国学术的发展要靠学派，这个学派一脉下来，时间要很长，只有绵延不绝，才能发展到一个高峰。中国的文学流派，从散文来讲，《左传》下来是《孟子》、《荀子》，此后隔了几百年转到《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之后又没有了，转到六朝骈文，韩、柳、欧、苏一代二代而终。韩愈的传人有李翱，苏轼的传人有秦观、黄庭坚，再下去就没有了。所以，中国文坛很少有像桐城派这样的文派，“代有传人”是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点。桐城派能够延续下来，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这个特点值得研究。桐城派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仅有文学实践，而且有其理论：方苞提出的“义法”，刘大櫆提出的“神气”，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曾国藩、姚莹再加一个“经世”。桐城派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抨击和批评，是因为作为当时势力最大的文学流派，有些方面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批判的对象。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发出了一些很激烈的言论，矫枉过正，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是不破不立。虽然陈独秀等人的言论有片面性，但五四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功绩是伟大的。至于他们的一些激烈言论，我们今天应该冷静对待。而至于桐城派，我们更不能把他们的文章都当成糟粕，一



概扫进垃圾堆。实际上，五四运动人物的古文修养都是很好的，他们也很了解古代文学的精髓。桐城派古文的“义法”，就是“言有物，言有序”，就是内容的充实和形式的美。这些都是文学的要求，不能算是错误的。五四运动中批判“言有物”，实际上批判的是程朱理学。其实桐城派的很多文章都不是讲理学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文章讲究形式、讲究艺术、讲究结构和方法，这些还是很有必要的。你可以说它讲得不够，或者不全面、不完整，但你不能说“言有序”有问题。当时将桐城派的文章比作“八股”，但桐城派的文章与八股文是不一样的，虽然桐城派中的许多人（如方苞、戴名世）善于作八股文。桐城派的文章在内容上还是比较丰富的，有讲学理的文章，有叙事的文章，有描写景色的文章，有写人物的传记，并且形式也是曲折变化，不是千篇一律。这也是桐城派的价值之一。

现在强调要重视对桐城派的研究，另外一个原因是桐城派文学创作的力量之源在于它创新求变的进取精神。桐城派既不拒绝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也决不望着前人的项背止步不前；既从传统中汲取有益养分，也对传统实行有限度的“背叛”；既不数典忘祖，也不因循守旧，他们的文论思想始终强调一个“变”字。因此，桐城派从产生那天起，就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狭小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完善系统，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桐城派强调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桐城派的理论和创作，始终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到晚清时期，世变日蹙，许多桐城派作家都主张变法图强，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新学，严复、林纾大量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文学名著，这些都是桐城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创新求变的体现。所以，桐城文化也好，桐城派也好，都是尚待开发的文化资源富矿，我们应该去发现，去开发，去利用。

我虽然没有去过桐城，但从《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的申报与整理以及同志们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桐城市的领导非常有眼光，支持项目申报，重视研究与弘扬桐城文化，积极承担传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体现了文化自觉。现在他们又要编撰出版一套《桐城历史文化丛书》，全面介绍桐城文化的丰厚内容和辉煌成就，旨在宣传桐城，提高桐城的知名度，提升桐城的影响力，意义十分重大。现将自己关于桐城派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作为这套丛书的序。

序二

戴廷杰[法国]

残冬之晨，寂寥读书窗下，忽得江君小角万里函，云有桐城丛书一编，将刊行于世，请为之序。予虽间握笔伸纸，似有立言之志，才短学薄，远西之微士而已，何敢应江君之请，而为数行以弁扬龙眠盛迹之鸿篇？无乃所谓着粪佛头乎？幡然思之，蒙如此之宠荣，遇如此之笃眷，奚可推辞，而或至蔑江君之友谊，逆东西之交流？昔者潘木厓先生，家藏书万卷，以为书公物也，不能私。今江君等人承先辈之遗风，不惧推其意，以斯文为天下之公物，岂非当世之大快事哉？然则不肖外人，洵无从逃避，不得不讷讷数言以归之。

廿余年前，肄业既毕，敝国史家龙先生巴尔，评予所为南山文祸之论文曰，生之大作，余甚喜之，惟历史与舆地，相为表里，不能分其学，重此而轻彼，生其尝游皖乎？赧然曰未往。退而太息，龙先生展阅拙文，一目了然，知予之足未踏桐城之土，予之口未吞龙眠之气，则岂不杰以南山先生所居之故乡为南山先生所记之意园，即以有名有实之旧县为书生意中之幻景乎？久之始下云楼而东，入北峡关，以至县治，乃皖然盱衡，四眺而叹曰，嘻乎，此是吾书中之桐城欤！若是万户之邑，百里之城，视四海之广，弹丸黑子耳，而其名垂宇宙，数百年之久，人之以巍科达官者，震耀天下，不可胜计，文之以精辞微理处，脍炙人口，曷可胜书，甚至为有清一代之正宗。此诚为中国历朝之所罕有，欧洲诸国之所未有矣。遂往视惜抱先生之树，过千载紫来之桥，东而登南山之墓，西而攀相国之陵，漫游平野，往来阡陌，观农夫之力耕田间，居民之勤治生产。予每游龙眠山之麓，虽不过一二日，犹足以知土田之肥沃、物产之丰夥、天地之神灵，而冥然潜心，溯流穷源，庶达至盛之泉。

夫斯文之兴于富裕，此天下万世之公理也。如大江之南，数百里而遥，即徽州府，以山多田少，人多释耒服贾，其商之豪富，士之贤才，遐迩莫不闻，故有商而兼士之说。兹窃其意曰，农而兼士，士而兼农，不亦桐城盛兴之机乎？然此言大旨耳，公理之象也，不足尽龙眠之所独有，善地之所奇特，而尤不克明其所以然者，是则斯文之统，安得存而不绝，累世荟萃，相继绍之以至于今乎？予翻阅龙眠之文久矣，虽稍知其大略，偶窥诸事之故，仅得其一二，而未之详。幸而予之蒙将发，非以恍然之大悟也，先正后学数君实为之矣。盖此数君者，与江君同志，慨然以传文统为任，以守遗绪为责，因博征龙眠之文献，以阐曩日之事、江山之胜、民间之俗、望族之法、登科之术、仕

途之道、文风之变，且无论耀光幽德，穷搜先辈之古文诗词，以拔其尤者。所辑所择诸珍，渐渐满筐，所辨所论诸作，冉冉盈筐，甚至成全璧，乃分若干篇，合为八册，名曰桐城历史文化丛书，而付之刊刷，以公海内。其书若龙眠乡之田园也，郁郁兼茂，有岁熟且丰，有实甘且多，终可止学者无穷之饥渴，兼补海隅书生之意园之所不能殖，岂不天下斯文之大盛事哉？于是书此数言以为序，江君其许之乎？

辛卯春日，戴廷杰拜题于巴黎寓中。

序三

胡连松

安徽素称文化大省，安徽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术界通常根据区域文化特征，把安徽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即桐城文化、徽州文化和淮河文化。从文化内涵来说，徽州文化内容繁富，涉及面广；淮河文化传统意味浓厚，时间跨度大；桐城文化主流意识强，对人性的关怀和制度的创设具有积极作用。桐城的文派、学派、诗派、书画派，以及丰富多彩的桐城民间文学，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桐城文化的创造力、吸引力、感染力和无穷的魅力，所以，学术界有人认为桐城文化是精致文化。

我们今天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怎么弘扬，弘扬什么，是大家必须要正视的一个严肃话题。桐城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宣传它？这是所有关心桐城文化、热爱桐城文化的人，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桐城文化始于唐代，成名于宋代，崛起于明代，鼎盛于清代。一代代学者、一批批官宦，他们都坚守传统，热爱自然，心忧国家安危，情系黎民百姓，把中国士大夫、文人阶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以济世救民的胸怀积极入世，这在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他们创作的文章，题材丰富，礼、乐、兵、农和国计民生，无不涉及，包罗万象。许多人弃官从教，以传授知识为乐，同时结交百姓，关心民众的疾苦，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桐城文人士大夫发出的呐喊声音。从我个人对桐城文化的认识来看，桐城文化的主要精神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

首先，桐城文化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从历次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和桐城文人对为国献身者的歌颂来看，无不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在国势衰微的情景下，桐城人表现出来的爱国立场更坚定，不但写出了一大批洋溢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华丽篇章，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鼓舞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抗击侵略，而且为时贤、名宦献计献策。姚莹“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积极建议并全力支持林则徐禁烟，站在人民一边，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他在台湾的抗英事迹，可歌可泣。与此同时，许多桐城人与时俱进，提出了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富国强民、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例如，国学大师吴汝纶关注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对进化论在我国的传播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他给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书作序，还提出修改意见，并四处托人帮助销售，以扩大其影响，通过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思想，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其次，桐城文化体现了追求文明、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在桐城，读书习礼成为时尚。明清两代，桐城“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许多贤达智者，淡泊名利，开办乡学，口传笔授，教学相长，革故纳新，在科举仕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桐城祖训，充分体现了桐城人刻苦励学、知书达理、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优秀品质。

再次，桐城文化体现了与人为善、和谐相处的平等精神。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桐城先贤对父母敬爱有加，笃守孝道；兄弟之间，相互扶持，至老不衰；对宗亲，体恤周济，不遗余力；对朋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邻里相处，以礼为先，以和为贵，以让为贤。日常生活中，处处都体现“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崇高风尚。乾隆年间，桐城发生严重灾荒，民皆饥乏，草根树皮掘剥殆尽。身为一介穷儒的桐城派宗师刘大櫆焦急万分，建议在乡里建立义仓，主张藏粮于民，要求乡里名流及富户捐资救助贫困交加、求救无门的人。此议被当政者采纳，饥民大受其惠。清代大学士张英谦让邻里，让出一个名扬天下的“六尺巷”。如今，他在家书后亲批的诗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早已流传海内外，成为解决邻里纠纷的最好范例。国务委员唐家璇在桐城参观六尺巷时指出：“六尺巷在历史上是宰相以宽厚的胸怀妥善解决邻里纠纷留下的，在今天，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生动教材。”

我去年当选为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会长，思考如何利用研究会这一平台，来宣传桐城文化，研究桐城文化，弘扬桐城文化。这次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编撰《桐城历史文化丛书》，我非常高兴。这不仅为宣传桐城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也是响应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强省的号召，推动安徽地域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件大事，所以我非常乐于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宣传、呼吁。通览全书的大纲和篇目，感慨良多，写出上述体会和认识。

序四

王强

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因为时代的变迁与区域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桐城文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千百年来，桐城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令人惊羡的文化奇迹，催动着恢宏的文学景象不断萌生。尤其是清代以降，桐城派异军突起，一时间“家家桐城、人人方姚”，风骚独领，蔚为大观。后世文人回首这一奇丽的文化现象，也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何意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

历史烟云消散，文化魅力永恒。地域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一个地方精之所存，气之所蕴，神之所附。回眸既往，历史的沧桑与荣耀已被桐城人民深深铭刻在岁月深处，而在发展车轮的滚滚节拍中，桐城踏实而从容的前进步点，又不断叩击着崭新的梦想。在关山飞渡、踏浪前行的历史进程中，桐城文化中所蕴含的忠诚务实的报国情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谐精致的处世理念，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独树一帜的创新风格，仍是桐城人民引以自豪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本质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文风昌盛的江淮名邑、风光秀丽的皖中胜地、百业兴旺的和谐之城，桐城以全方位的改革创新，迎来了全方位的兴盛与繁荣，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文化是引导社会进步的罗盘，是一座城市的精魂，它对思想解放起着引领作用，对经济发展起着先导作用，对社会和谐起着滋润作用。

我虽不是土生土长的桐城人，但我对桐城的认识、了解、倾慕由来已久。在我的故乡宿松，至今仍然流传着一代大儒朱书与桐城派开创者戴名世、方苞抵掌论文、击节而歌的动人故事。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常常于不经意间，在校园的某个角落，与吴汝纶、姚永朴、马其昶、朱光潜等桐城名士留下的燕园往事不期而遇，感动之情油然而生。今年初春，我带着组织上的信任和厚爱来桐城工作，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片土地上散发的浓郁人文气息和绵延不绝的创造力量。我认为，文化底蕴深厚是桐城发展的优势所在，在桐城，不注重桐城派的研究与挖掘，不重视文化工作，在政治上就是不敏感，在经济上就是不内行，在文化上就是败家子。民族之魂，文以化之；城市之魂，文以铸之。文化一旦“缺位”，就意味着桐城在未来竞争格局中的“失位”。当前，桐城正处在争先进位、追赶跨越的关键时期，为了实现“在安庆当龙头，做表率；在全省争位



次，进‘十强’；在全国创品牌，树形象”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抢抓融入合肥经济圈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实施的大好机遇，发挥桐城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文化优势，坚持工业立市不动摇，着力推进文化强市，力争早日把桐城建设成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先行区和试验区，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现代化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不断增强实力、激发活力、彰显魅力，需要我们进一步继承、发扬和光大桐城优秀的历史文化。

《桐城历史文化丛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展示了桐城的科举风貌、名宦风采、文学风姿、民俗风情和名胜风光，可谓荟萃众美，通贯古今，图文并茂，雅俗共赏。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桐城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又是继承和发扬桐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文化的延续性在于继承，文化的包容性在于开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当然不是抱残守缺，守旧复古，而是在发掘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基础上，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创造出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的文化产品和新的文化业态，为经济社会发展催生出新的增长点。《桐城历史文化丛书》的编撰出版，无疑在这方面起到了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发掘、研究、宣传、弘扬桐城文化的行动中来，续写无愧于先贤、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世的文化新篇！

是为序。

前言

—

《桐城明清诗选》是《桐城历史文化丛书》的一个分册。桐城历史文化包含诸多领域、诸多内容，其中自然少不了桐城历代诗歌。中国是诗的国度，桐城是诗的乡邦。桐城人自小就是在文风诗雨的浸润中长大的，哪怕咿呀学语的三岁幼儿，也能背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来，更别说那些对诗情有独钟的文人是如何地爱诗作诗了。他们以诗会友、以诗抒怀、以诗怡情，终生乐此不疲，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以至于不少学者提出桐城不仅有“桐城文派”，而且还有一个“桐城诗派”的主张。清桐城文派重要作家姚莹即说过：“窃尝论之，自齐蓉川廉访以诗著有明中叶，钱田间振于晚季，自是作者如林。是以康熙中潘木崖有《龙眠诗》之选，犹未及其盛也。海峰出而大振，惜翁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诸家之美，无一不备矣。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有然哉！”（《桐旧集序》）著名学者吴孟复先生在他的《桐城文派述论》里亦指出：“与姚莹同门之梅曾亮也说‘是时文派多，独契桐城诗’（《书示张生端甫》）。清末程秉钊亦谓‘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读清人诗集》）！百年以来，诸家皆盛称‘桐城之诗’，且肯定其可以自成一派。现代钱基博还说：‘惜抱之文，盛极而衰；惜抱之诗，方兴未艾。’（《石遗先生八十寿序》）……今日学者钱钟书亦赞同程说，甚至谓桐城之诗胜于桐城之文（《谈艺录》）。”可见桐城诗的影响和地位。

然而仔细检索桐城历代诗歌，探寻它的发展脉络，却不能回避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前面所指的主要是明清诗坛，而明代以前却很少见到署名“桐城”的诗人和诗作。即使是唐代诗人曹松，史料中也只说他是舒州人，说他

是桐城人，那是后人考证考出来的。即便如此，在收诗四万八千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的《全唐诗》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人。宋代的情形也大体差不多。如此看来，难道明代以前桐城仅是一片诗歌的荒原，根本就没有参与“唐诗宋词”的双璧大合唱？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桐城历史悠久，建县较早。自从唐至德二年（757）由同安县改称桐城县，直至1996年撤县设市，历经一千二百余年从未更名过。这相对于那些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改变地名和域名的地区来说，是不多见的。历史悠久，政区稳定，文化的积淀自然也会丰厚，很难想象桐城会自外于唐宋诗歌的繁荣。况且从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来说，起起伏伏，盛衰嬗变也是有的，但也很难想象一邑之地会突然从唐宋时期的诗歌荒原，一下进入明清时期的诗歌井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桐城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桐城先贤徐璈所给出的答案不无道理。他说：“桐城，在汉为乡，依山建城肇于唐至德间。然自宋元以前，著闻纪传之人，类统称为舒州。舒州者，兼今怀宁、舒城之域。惟洎有明以后，凡皖北舒南之产，皆别之为桐，不至纷淆。而五六百年内，名臣硕儒文人畸士亦相继林出，其往行故迹流风余韵传于文字见于篇什，较之宋元以前近而可征、广而能备矣！”（《桐旧集引》）这就是说，有明以后，桐城的事才被著闻纪传之人“别之为桐”，而明代以前，皆被统称为舒州，有关桐城的史料往往被著录于舒州名下了。或许这就是明代以前如《全唐诗》等文史资料不见著录桐城作者作品的根本原因。

二

既然桐城在明代以前的著闻纪传中被统称为舒州，而舒州又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域概念，因此也就无法从舒州诗的发展脉络和规模中，剥离出桐城诗的发展脉络和规模。故而人们现在所说的桐城诗主要指明清时期的桐城诗，研究桐城诗主要也是研究明清时期的桐城诗。

明清时期，桐城诗人众多，名家辈出。姚莹说：“自齐蓉川廉访以诗著有

明中叶，钱田间振于晚季，自是作者如林。”那是就其规模声势概而论之。其实在明代中叶以前，桐城诗坛就已经相当活跃了。方法、邱宁、谢佑、姚旭、方向、袁宏等，都是当时较有名气的诗人，大多都有诗集传世，只不过尚未形成一种独特的流派和诗风。迨至齐之鸾（号蓉川），以及差不多同时代的钱如京、余珊、吴檄、何唐等人登上诗坛，不仅作者队伍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也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七子”的“遒劲之气”（朱之蕃《盛明百家诗选》）和“无所依附”（钱澄之《蓉川集序》）的独特诗风，为桐城诗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钱元鼎、赵钱、方学渐、齐莱名、吴应宾、袁自华、何如宠、戴耆显、刘允昌、左光斗、张秉文、方大铉、马懋功、方大任、方孔炤、姚康、吴绍奇、方文、方拱乾、方维仪、方以智、姚孙棐、马之瑛等起而继之，将明代桐城的诗歌创作推上了一个顶峰。

明清鼎革，社会动荡，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桐城诗坛的繁盛局面。姚文然、周岐、孙临、邓广森、左国斌、吴道约、方其义、钱澄之、李雅、方中履、祝祺、方亨咸、方孝标等，他们关注社会，忧国忧民，创作出了大量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后随着清代社会逐渐步入稳定和繁荣，桐城诗坛也伴随着桐城士子宦途的成功和桐城文派的崛起而大放异彩。程芳朝、方畿、何采、陈焯、姚文燮、江皋、方中通、张英、张茂稷、姚孙枚、潘江、姚文熊、马教思、姚士蘋、孙元衡、方登峰、张廷玉、方苞、方贞观、方世济、胡宗绪、张廷璐、方正瑗、马朴臣、方观承、姚范、刘大櫆、姚鼐、汪志伊、方维甸、方绩、王灼、朱雅、马宗琏、姚莹、龙汝言、方东树、徐璈、刘开、戴钧衡等人，耳濡目染，教学相长，情动于衷，相辅相成，都在桐城诗坛上赢得了一席之位。就连父亲力戒其为文弃诗、自己也发誓“绝意不为诗”的方苞，到底也还是有些诗作传世，雪泥鸿爪，难能可贵。至于姚鼐，正如钱基博所说“惜抱之文，盛极而衰；惜抱之诗，方兴未艾”，只因他是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文名盖过诗名罢了。可以说，桐城文派的作家基本都是桐城诗的作者，但桐城诗的作者未必就是桐城文派的作家。在桐城境内，桐城诗作者的代表性和广

泛性是远远超过桐城文派的。

桐城明清诗坛，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支“红粉”军团。吴应宾的女儿吴令则、吴令仪，潘江的母亲吴坤元，姚孙棐的女儿姚凤仪，方大镇的长女、张秉文的妻子方孟式，方大镇的女儿、姚孙棨的妻子方维仪，方大铉的女儿方维则，方以智的妻子潘翟，张英的女儿张令仪等，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或结社联谊，相互唱和，或抒怀闺帏，孤芳自赏，多有诗集传世，被朱彝尊《明诗综》等重要选本选录的也不乏其例，成为桐城诗坛的一大亮色。

清末到民国年间，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桐城文派经过了二百余年的发展和辉煌，终于走入了衰微，其文坛霸主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但是桐城诗却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也许因为它的立意和内容不像桐城文派的“文以载道”那样和新文化格格不入，也许因为它的风格与王士禛的神韵、沈德潜的格律、袁枚的性灵一样均属清代诗坛的一个流派而受到理解和宽容，也许因为它的理论和实践被桐城文派的光芒所遮掩还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总之桐城诗还在按着它原本的发展趋势向前发展着。吴汝纶、方守彝、方守敦、苏行钩、马君实、姚永朴、姚永概、江百川、张皖光、严石泉、潘田、吴闿生等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中有的是桐城文派末期的代表作家，诗文并举，但也有并非文派派内之人，而仅以诗名著世。桐城诗的这种连绵不竭的顽强生命力较之桐城文派显然又是略胜一筹了。

建国后，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学术文化氛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古典诗歌的创作不再是一种文化时尚，不再为文化人所刻意追求，但是作为一种咏物写实、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在桐城仍然有它的生命力。不仅那些经过了旧式教育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以诗自娱，乐此不疲，而且一些文学新秀也不时地叩门扫阶，欲登大雅之堂，使桐城古典诗歌创作一直后继有人，余绪不堕。20世纪90年代初，桐城成立“诗词学会”，并出版《桐城诗词》会刊，至今已连续出版18期，便是明证。

三

桐城古典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作者众多，作品宏丰，诗集、诗文集、选集汗牛充栋。遗憾的是，随着时光流逝，现在我们仅知其名而不见其书的已比比皆是。徐璈《桐旧集·例言》云：“专集未付镌者往往渐就湮没，即刻本亦未能尽存……至选本如钱田间先生《诗选》、方龕山先生《四十家诗》、姚羹湖先生《诗传》、马湘灵先生《诗钞》，遍访无从得观，可胜浩叹！”徐璈选编《桐旧集》距今已越一个半世纪，当时他所能见到的，我们今天可能又是“无从得观”了，岂不更加“可胜浩叹”乎！至于徐璈之后的诗人诗集，境况也是存少佚多，而且时间越靠前情况越严重。存世者，真是吉光片羽，殊为珍贵！《桐旧集》便是其中之一。

《桐旧集》是邑人徐璈在乡先贤潘木崖所辑《龙眠风雅》的基础上增辑而成。徐璈工诗善文，尤其热衷于乡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他“以木崖未见后来之盛，欲通前后更钞之，购求精择二十余年，乃有《桐旧集》之钞”（姚莹《桐旧集序》）。该书选自明初至清道光二十年（1840）500年间桐城85姓1200余家诗作7700余首。这在桐城明清时期总体诗作中所占比重虽然不大，但在那些诗作大多散佚湮没的情况下，可就显得弥足珍贵了。此次《桐城历史文化丛书》的《桐城明清诗选》分册即主要依据该书精选而成。此前的桐城诗作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不作上溯；此后的则根据所能搜集到的大家专集增选续成。下限原则上止于终清之世，极少数略为下延，如姚永朴、姚永概等。一则他们本是跨朝代的人物，前靠后依均可两便；二则他们都是桐城文派末期主要作家，可让读者多角度地认识他们。至于民国及其以后的桐城诗作，由于时间较近，读者易于获取，加上本书篇幅和体例所限，就不予选录了。

本书共选录桐城明清时期235家1109首诗作。选录的原则是作者的典型性与广泛性兼顾，作品体裁与题材内容的多样性兼顾。作者方面既重视在桐城历史上影响卓著的名人，也不薄名不见经传但在诗歌领域有所造诣，甚或只有一首之秀、一字之奇的平民作者。如盛汝谦、叶酉存诗仅有一首，亦予

选录，不使缺位；吴鳌虽是布衣，但却是平民诗人的代表，亦给予其一席之位。体裁方面，古体、近体、杂体兼收，但视作者所长而有所侧重。题材内容方面，凡被明清重要选集，如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清诗别裁》选收的诗作尽量收录外，则侧重收录歌咏家乡山川风物、游子思念故园、论诗论文以及地方史事之作，这些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他的如怀古、交谊、林泉之作则酌情收录。

本书作者排序，原则上以其出生先后为序，出生时间不详者则以其获取科举功名的先后为序。每位作者均附有简介，文字多寡视情而定。同一作者的诗作排序则按照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为序，少数六言、杂言酌情处理。页下注文除另作说明者外，均为作者自注。按照丛书统一要求，采用简体字，少数生僻异体字径改为常用字体，如稊作槁、胞作脆等，不出校记。脱漏字以“□”表示。

由于时间紧迫，本人学识浅陋，诗作选编未必精当，点校讹误亦在所难免，还望方家时贤不吝赐教。

目录

方法

1 / 蜀中逢客作

1 / 绝命辞

邱宁

1 / 投子山胜因寺步叶太守壁间韵

谢佑

1 / 严滩

2 / 山居

章纶

2 / 之官武昌和弟颐庵双溪送别韵

姚旭

2 / 管叔城

2 / 次韵答范德章郎中

2 / 舟过洞庭遇雨

方向

2 / 桃源道中

3 / 寄皖中诸友

3 / 田家谣

袁宏

3 / 游晋祠观难老泉

钱如京

3 / 夜归

3 / 招鹤

3 / 送客

余珊

4 / 送沈侍御归养

4 / 东岩

齐之鸾

4 / 宁州晓发

5 / 晚宿良乡

5 / 龙门金

5 / 稠桑道中

5 / 浦口晓发

5 / 拟古少年行

6 / 书郾城县台壁

6 / 郯州晓发

6 / 郢城壁

6 / 灵佑驿次毛东塘韵

6 / 清平驿坐雨

6 / 将至威武堡

6 / 元旦次潘宗鲁韵

6 / 乌江吊古

6 / 将至茌平

6 / 谒范韩祠

7 / 临城驿夜坐